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程序化”“执政” ——简析中国三十年来执政哲学的程序理性转向，兼谈作为社会行为 (制度) 正当性依据的科学的意象的变迁

涂 明君¹

摘要

1977年开始的从革命思维向执政哲学的转向，以形象模糊的科学为社会行为(制度)的正当性依据，以对科学作常识化、实用化解读的程序理性为执政哲学基础。随着科学意象的变迁，语义含混的程序理性大致经历了如下四个发展阶段：1977-1979年自觉苏醒后自发地反对“两个凡是”程式化束缚、1979-1989年自在地“摸着石头过河”试错性探索前进并初步去意识形态地提出初级阶段论、1990年-2002年自为地市场体制改革形成经济理性的初级阶段纲领并诱致性变迁到制度理性的政治民主程序化、2002年开始自反地多元化解读程序性发展道路中的科学与人文并试图以科学性兼容超越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从第一到第三个阶段末所形成的程序化理念尚为伸张程序价值论，就因最后一个阶段科学化泛化的泛化而表现出某种复古性地倒退：虽然新程序主义试图以程序与契约相互论证来协调程序与道德，但深植于传统思维模式中的道统意识形态基本占据上风并将科学上升为某种道德意识形态抑制程序理性；同时，道统本身却又存在道德真空的巨大困境，道德理想的混乱和虚妄，给了集中的政治权力将程序拉回到工具性僵化程式以机会。如何融贯中西地处理程序(化)与道德和权力的关系，是程序化建设的关键，也是中国模式之探讨的核心问题。

关键词 执政哲学；程序理性；渐进改革；科学；正当性

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中国更被指为党国体制。1978年底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后，跳出革命思维的执政党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条渐进改革道路，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也成为广大知识分子思考和争论的重大问题。其中思想界(新)自由主义、(新)左派和新保守(权威)主义之间的争论规模和影响最大。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虽然以批判的姿态有效地、有价值地制衡和鞭策着新权威主义，但相对疏末于主流意识形态。新保守主义者萧功秦利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为“中国的大转型”描绘出了一幅政治社会学图景，^[1]虽然尝试着作出思

想文化史解释，但其中国化哲学自我意识相对薄弱，缺乏系统的哲学基础作支撑。其他如经济学类邹东涛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²、林岗《中国的经济改革道路：实质、意义和前景》，^[2]政治学类乔舒亚·雷默(J.C. Ramo)“北京共识”和其他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3]丹尼·罗德里克(D.Rodrick)“诊断法”和胡鞍钢学习、竞争和创新模式^[4]，萨米尔·阿明(S.Amin)“走向欧亚的重建”和大卫·施韦卡特(D. Schweickart)“后继体系理论”，政治理论类俞可平“中国模式”^[5]和郑必坚“中国崛起”，都存在与萧说类似的缺憾。

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哲学转向，

以意象模糊、并不清晰的科学为社会行为(制度)的正当性依据,以语义含混、并不成熟的程序理性为制定政策的哲学基础。随着科学意象的变迁,对科学常识化(借用金观涛、刘青峰语)、实用化(借用李泽厚语)解读的程序理性相应地大致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自发地反程式、自在地试错性阶段化、自为地纲领性程序化和自反地科学性自组织。即,1977-1979年自觉苏醒后自发地反对“两个凡是”程式化束缚、1979-1989年自在地“摸着石头过河”试错性探索前进并初步去意识形态化地提出初级阶段论、1990年-2002年自为地市场体制改革形成经济理性的初级阶段纲领并诱致性变迁到制度理性的政治民主程序化、2002年开始自反地多元化解读程序性发展道路中的科学与人文并试图以科学性兼容超越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

四阶段论属于以偏概全的理念型提炼,每个阶段均包含其他阶段的部分内容。而且,越是靠近今天的历史,越是被活着的人的主观性所遮蔽;事实上,程序理性在中国还远未成型和健全,自为地程序化和自反地科学化只是一种倾向,其发展存在若干变数,³有待进一步观察,故而只能做简单分析和初步前瞻。本文的重点是相对明确呈现出来的前两个半阶段,但对程序理性在道统意识形态复古大潮中的未来发展表达一定程度的担忧。

I “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以科学实践为正当性依据自发地突破封闭程式

“文化大革命”有其部分合理性,因为它希望以大革命和大民主的方式打倒高度集权模式所带来的官僚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程式化固然不错,但连着一块把程序理性也彻底抛弃,最后的结局自然是脱序失范,导致革命自身也成为革命对象,辉煌自焚。“粉碎”“四人帮”,以革命的方式结束“文化大革命”。文革结束了,但革命却还远未结束,其灵魂仍在:与传统“气论”和烈士精神有着紧密联系的非理性激进革命理念依然深藏于时

人意识深处;较激进革命更为宽泛的革命理论体现着价值理性⁴和道德理性,确有纠工具理性之偏的人文理想价值;革命话语作为传统资源,既可以为(新)左派也可以为改革新政提供可以利用的正当性依据。由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成为1977年前后华国锋、邓小平等各方都能接受的一个过渡性口号。⁵

1 用科学“革命”挑战“两个凡是”

表面看来,吴江1977年7月发表《“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6],将革命的外延从单纯的上层建筑扩大到文化、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革命,有泛革命化之嫌;但它实际上消解了激进革命观中的阶级斗争和批判运动内涵,在保留创新性发展的同时放弃了革命的暴力破坏性,为革命话语开辟了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的新领域。更重要的是,它动摇了无产阶级对革命所拥有的专属权——科学技术革命,知识分子当然也有资格参加;生产力革命,也并不绝对排斥非无产阶级。或许吴江本人也没有意识到,这样一来,革命仍然在继续,但它前面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前提,却开始被质疑。阶级分析,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和精华,它受到怀疑,这当然是关系到执政正当性的一个原则性的重大问题。

按照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需要进步的阶级来领导;而无产阶级具有最纯粹的无产阶级道德,如一穷二白最渴望革命、大公无私最能够革命等等,其优秀品质和高尚道德决定了他们是最先进的阶级,决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先进性和正当性——此所谓“贵有以行令,贱有以忘卑”。⁶而无产阶级领袖和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无疑是道德品质优秀中最优秀者、高尚中最高尚者。虽然林彪事件已经使少部分人懵懂地觉得领袖原来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道德圣人”,从而觉得这套道德政治逻辑有些问题,但它的确还是被广泛接受的执政哲学。⁷毛虽然去世了,但在广大群众中依然享有崇

高威望。所以一方面要加紧把新的领导人树立为具有高尚的无产阶级道德品质的英明领袖——“衔命者，君之尊也”，⁸另一方面还要借重毛的影响和既有政治体制资源以收拾乱局、稳定人心、巩固政权、重建德治。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政治哲学的外在表现，就是“两个凡是”。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在这里，毛泽东生前的决策和指示变成了类似于古代皇帝所下的圣旨，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如何维护和遵循，则还需要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官僚体制。文革之初，旧的国家机器的确被摧毁了，但取而代之的却是“更加集权、更加一体化、一元化”的革命委员会体制。^{[7]P230}“两个凡是”利用并维护着既有的官僚主义体制资源，通过对已故领袖的盲从迷信，压制个人自主性，延续文革的种种行为——哪怕它是非理性的。社会仍然是一块高度同质化和板块化的砖墙，它钳制理性与个人活力，缺乏弹性程序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和政治机制。吴江探讨“继续革命”的问题，质疑了执政主体的界定和执政目的的范围，从而间接质疑了这套执政体制的正当性，挑战了“两个凡是”的形式主义程式化倾向，被胡耀邦称作“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或被传为‘第一声号角’）”实至名归。

接下来，邓小平在1977年4月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批评“两个凡是”后，更直截了当地用了科学的名义：“‘两个凡是’不科学”。他还在7月复出后多次强调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和作风，^{[8]PP2.4} 聂荣臻、陈云和叶剑英也公开表示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上宣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既提升了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也通过扩展生产力和工人阶级的外延暂时重新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当性。会议在强调科学创造性的同时，指出科学要实事求是。把科学的内容包含到生产力之中、把科学的

本性定义为实事求是、把科学看作“正确”的化身，都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奠定了基础。邓小平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复出的时候为什么都要抓科学工作？其最原始动机已不可考。可以观察到的是科学作为理性的象征成为反对非理性既有政策（及其哲学）的重要武器；而且，在邓和胡耀邦的主导下，科学日益高调地成为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行动（制度）性的正当性根据。

2 真理标准大讨论与“科学真理”的正当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正用作论据的实践，除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运用，就只有发现新元素证明元素周期表和发现海王星证明太阳系学说两个科学史方面的例子。该文主要是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包括毛泽东本人的理论和文章来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的，是主要用“真理”而非“实践”来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这个论证过程虽然存在明显的逻辑悖论，也没有完全否定真理的绝对性，没有完全封锁“理性建构主义”的道路；该文对科学史还有误引。但这些都无伤大雅，甚至多年来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些逻辑悖论和史料错误。

大讨论的主要成果，是“实践”在意识形态哲学上取得了最后裁决者的地位。对立统一且更强调矛盾冲突的《矛盾论》没有被抛弃，但注重经验的《实践论》却无疑成为了意识形态舞台上新的主角。真理需要检验，实践需要探索。探索在一开始的时候可以显得比较杂乱、没有头绪，但实事求是的探索，最终是要探索出“是”，探索出事物的规律，探索出方法的程序。重提《实践论》，突破了形式主义程式对实践性探索的封闭，开辟了程序性探索的路径。

大讨论的另一个效应是将科学真理与马列主义真理并列，将科学实践论证科学真理与社会实践论证马列主义并列；将科学实践看作是正确的实践，将科学活动所反映的意

识形态看作是正确意识形态从而将其接纳为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这就不仅为科学哲学影响政治哲学开启了大门，而且把科学放到了一个同马克思主义同等正确的地位上，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了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倾向。这一效应一直影响着中国三十年来的（政治）思想演变历程。当然，此时的科学刚刚重获新生，人们只是在下意识里认定其正确，而并没有仔细省查它同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和冲突，更谈不上冲击和颠覆，只能说科学主义初露端倪。

这种对待科学的不明朗态度，既可能产生西方式的道德与理性两分，也可能产生把科学技术作为最高价值的科学主义，还可能产生把科学看作服从于某种道德幻想的纯粹的工具。不管向哪个方向演变，科学的意象都会与程序理性的内涵发生密切的互动。

3 三中全会标志着程序理性的苏醒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在此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对真理标准大讨论与“两个凡是”、实行改革开放和党内民主生活等重大问题作出结论，并且批评了前一时期一元化领导方式。这一次高层会议，的确让与会者在有限的范围内（关键之处尚由政治局常委会左右）尽可能地民主讨论，^[9]这些高职位党员的个人权力真正体现了出来。1979年1月《人民日报》社论《发扬民主和实现四化》，将民主的理念重新播撒到全国，民主程序获得生长空间。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10]表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被放弃。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定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左倾错误理论”，“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11]在这一理论雪崩式瓦解的几年时间里，各级革命委员会相继被取消，人民政府的组织机制得以恢复。

斗争和运动等话语渐渐淡出了意识形态的历史舞台，实践、科学和民主等成为社会行动（制度）的正当性依据。科学和民主从封闭的程式中走了出来，现代程序诉求也就必然会跟着出现。⁹但冰封日久，科学和民主都需要一个生发和成熟的过程，程序理性也需要一个萌芽和成长的过程。这个重新萌芽的过程，首先是靠“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朴素的程序理性去逐渐消解意识形态的禁锢，从而为程序理性自身赢得成长空间的。

II 从自在的“摸着石头过河”渐进策略到试错性摸索前进的“初级阶段论”

“摸着石头过河”并非改革者的专利，在1969年7月北京大学宣传队（主要由解放军和工人组成）向北京市革委会汇报、并由后者向中央送上、最后由毛批示“照发”全国的《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中，就有“摸着石头过河”，扎扎实实地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的表述。^[12]意思是知错就改才是坚持毛泽东思想，才能修正错误把坏事扭转过来变成好事。应该承认其中蕴含了试错和稳妥的理念，但在文革时期显然不是主流，而且还必须服从于毛泽东思想，最终目的是懂得如何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而非去自主地探索真理。

1 “摸着石头过河”：陈云的“稳妥”，还是邓小平的“摸索前进”？

在改革派内部使用“摸着石头过河”的非邓小平，而是陈云。1950年4月陈云在政务院政务会议发言和1951年7月指出“办法也应该稳妥，这叫摸着石头过河。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须注意这点。”^[13]^{P152}针对激进主义情绪下“毛毛草草”的冒进做法，陈云强调稳妥。1961年3月陈云对“摸论”作出实践论解释：“搞试验要敢想、敢说、敢做，但在具体做时，必须从实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要把试验和推广分开，推广必

须是成熟的东西，未成熟之前不能大干。人是需要经验教训的，老头子头发变白，就是碰钉子碰出来的。”^[14]1960年代初所谓的经验教训，显指大跃进之后的大面积饥荒造成饿死人乃至人食人的人间惨剧。陈用经验主义的渐进程序理性批评浪漫主义的革命乌托邦，代表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陈云等被剑桥史书认为的“渐进主义”^{[15]PP52-83}和“50年代中期经济学”^{[16] P378}的基本哲学立场。但事实上，程序理性至多只能理解为一种在强势革命激情中的潜在对立面，虽偶有觉醒迹象，但在1978年以前从未形成气候，^[17]这顶多是黑夜里的一次短暂梦醒，之后还是沉睡。

对中国社会产生较大实际影响的“摸论”，是陈云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时发表《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18]P279}。邓在闭幕会上肯定了陈的报告：“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31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由此，“摸着石头过河”成为改革方法论的指导性原则。

事实上，对“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解，陈云与邓小平并不完全一致。本文认为，陈云的“摸论”不能完全代表执政哲学的基本方针。邓小平当然注重经验教训，但他在“实事求是”之前还加上“解放思想”，不仅是一种政治谋略，也有思想文化内涵，可以说对科学精神的理解更加全面。以科学实践为正当性依据的改革，还要把科学的开放创造性拿来当意识形态，而不仅仅是老老实实地埋头于经验。虽然陈云在1984年6月又提“摸论”，但人们误以为“摸着石头过河”是邓小平提出的并非毫无道理。“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

索前进。”^{[19]p174}在人们对描绘新社会蓝图充满激情、在对作为新事物的改革满怀期待与宽容、在缺少内省的自由主义如地火般大面积熊熊燃烧的情况下，当时许多人对执政哲学的理解，显然更接受邓小平1985年的那个胡适式的、更进步的、更有激进色彩的表述“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20]p113}，而不是陈云偏保守的思想。

或许还有其他反对声音，陈云在1988年5月为自己做了辩护：“做工作，不能只想快。慢一点，稳一点，少走弯路，走弯路的损失比慢一点的损失多。有人批评说‘摸着石头过河’不对，但没有讲出道理来。‘九溪十八涧’，总要摸着石头过，总要下河去试一试。‘摸着石头过河’，这话没有错¹⁰”。^[21]“瞻前顾后，权衡利弊”当然没有错，但以“多谋善断”（叶永烈语）著称的陈，如果过分强调小步慢走，那就与小步快走的实践不符，与科学技术提高效率、提高生产率的主流意识形态闹别扭，被公众误解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人们并没有因为这些细微的差异而不真诚地拥护“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指导原则，只是在坚持经验主义渐进原则的同时，还增添了追求进步的内涵，并且在意识形态中或多或少多地保留着革命和自由的激情。这就存在一定的矛盾冲突。

2 程序性渐进思想与改革的制度层面

如何在实效主义的猫论下解决上述冲突？邓小平把程序性渐进方法不仅作为一个原则，还极力倡导要将渐进策略贯彻到制度改革中去。成中英曾经指出过方法有四个辩证互动的层次：本体、原则、制度到运作。^{[22]p17}邓小平一开始提出制度问题时就谈到了程序性和变革的辩证关系：“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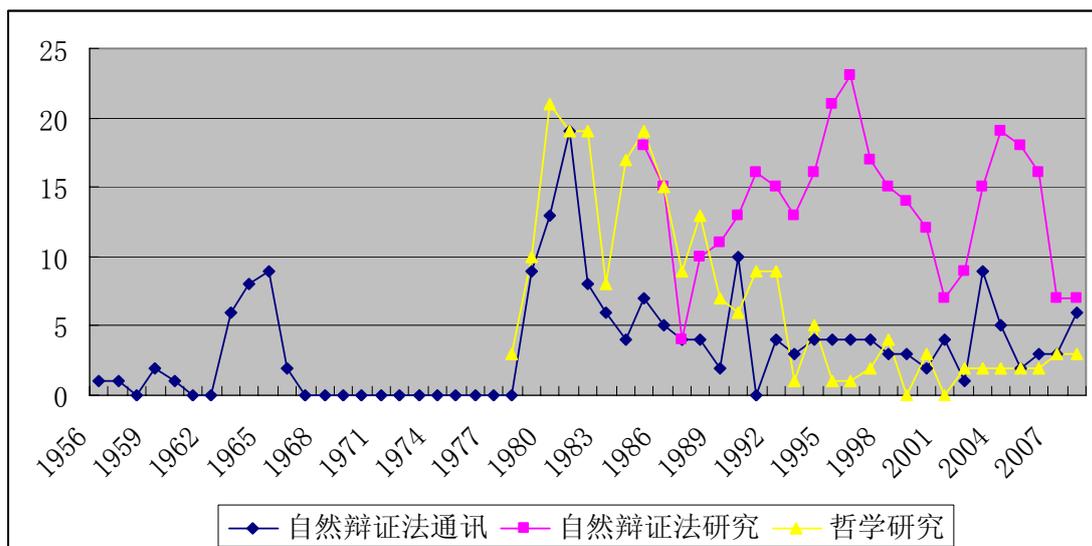


图1 科学哲学类核心期刊中“控制论”全文检索年篇数¹¹

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会有无限的希望。”

否定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并不是否定计划和循序渐进的程序理性。之所以强调计划性和步骤性的制度建设，是要为“坚决彻底的改革”奠定扎实的基础，使改革成果建立在一点一滴的程序性积累当中，从而使改革发展更加稳妥、更加牢靠。所以，邓小平在对“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革命观进行批评但保留革命话语的前提下，试图用程序渐进的方法去改革制度：“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方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23]p333、336}

这样，程序性渐进的思想，就不仅仅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而且要规范为制度；这里的制度，也不仅仅是经济制度，还关乎民主等政治问题：“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24]p196}、“（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25]p177}事实上，现代制度区别于传统制度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用弹性的程序取代僵化的程式，制度中的程序与普通的程序在程序理性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不

同。^[26]既然以程序渐进的思想指导制度改革，程序精神及必然会渗透到（法律）制度的具体内容当中。

3 试错性“控制论”对渐进主义的“科学”支持

程序渐进的指导思想、程序的基本精神，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总结一步经验。”^{[27]p1016}即反对冒进和大跃进，坚持按秩序一步一步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做，不指望把所有的事情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做完；走完一步，下几步看清楚，计划明确了，再迈出下一步；迈（探索）的过程中感觉到与预期有偏差，就收回来重新规划。如此，第二步、第三步……，最终达到过河目的。这种国人乐于接受的常识理性（金观涛、刘青峰语），科学哲学称之为启发式探索、试错性搜索或渐进性调试等等。这是复杂性自组织命题，在当时叫做系统科学（哲学）。通过对“控制论”和“系统论”在科学哲学的两本核心期刊上进行全文检索（图1），基本可以证明当时兴起了“系统热”；引领系统论兴起的，是控制论。控制论的精髓，就是负反馈自动调节，是试错性调试。

控制论是中国第一批自然辩证法研究者的主要课题之一。1955 到 1956 年，龚育之确定其汉译名称并翻译维纳《控制论》。紧接着钱学森回国，其具有国际学术水平的《工程控制论》被译成中文。到 1966 年的十年时间内，业界举行了数次研讨会并将国外控制论哲学论文摘编结集。因为在《工程控制论》的指导下中国研制出了火箭、导弹，发射了卫星，所以毛不仅在生前 7 次接见钱，并且仔细研究过控制论哲学问题并将其批注以《内部参考》的形式供高级干部学习。虽然说毛对某些控制论哲学观点持批评态度，但客观上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普及了控制论。¹²“文革”之后的邓所理解的科学，主要就包括控制论。

1978 年 4 月，《哲学研究》发文《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上讨论的一些理论问题》，介绍了 1977 年 12 月到 1978 年 1 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的主要内容，谈到“关于控制论”的新课题，这是“文革”后重要哲学期刊上第一次重现“控制论”。^[28]而在规划会议和文章发表期间的 3 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已经提到了“控制论”：“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29]p94}这个讲话邓小平没有亲自写初稿，但他审阅后修订、认可、确定并郑重宣读。讲话对控制论和科学技术的定位，是为了提高生产率这样一个实效的目的，这是对科学的一种简单的、工具理性式的理解，是目的理性中工具理性的主要方面。科学哲学界的想法当然要比这个表述复杂得多，如《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上讨论的一些理论问题》还谈到了用之于管理、人工智能思维模拟等，但首先还是要强调运用系统工程取得最大经济效益。

邓小平的讲话和自然辩证法的规划，宣告控制论复活。1979 年魏宏森撰写、钱学森审阅的《控制论方法与系统方法》成为新出

版的《自然辩证法讲义》的其中一章，为控制论的新一轮复兴热潮奠定了基础。从图 1 来看，这股热潮的高峰在 1980 年到 1982 年，余波绵延至 1990 年前后。¹³控制论在 1980 年代初的热潮很快就因为钱提出（大）系统科学观而扩展为更加广泛的“老三论”（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再加之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更多接近之处，“老三论”的热潮使得“系统”、“整体”成为普及度更高的词汇。但这与“控制”和“调节”并不矛盾——因为系统所涉及的更多只是观念层面，一谈到具体的实践，就要谈到机制和方法；而在科学成为正当性依据的时候，一谈到方法，自然就会以科学方法为正当乃至正确；借着自动化和钱学森的光环，控制论无疑代表着最新、最先进的科学方法。一般系统论和系统哲学的兴起，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延续了控制论研究的热潮。

这股热潮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不仅仅局限于讲话所圈定的“生产”领域，1980 年 3 月金峰、樊雷¹⁴等《控制论与制度改革》，标题已表明是冲着为社会改革提供理论依据而来。该文首先明确制度不仅要有阶级性，还要有科学性；制度结构的科学性，就要看它有意识的自动调节能力；这种制度能力的获得，还需要在科学技术革命的背景下不断地探索实践；探索的目的，就是要基于控制论的试错性动态反馈调节机制建立调节制度的制度，也就是否定革命委员会集鉴别、调节、执行为一身的机制，成立三个互不干扰的独立机构，实现“目标-鉴别-调节-执行-目标-.....”的，有科学、民主和法制作保障的良性循环。^{[30]pp5-11}这样，科学已经摆脱了阶级立场和阶级道德之类的束缚，明确成为制度的正当性依据。但如果把这里的科学性与阶级性的二分看成科学理性与终极价值的二分，那就有拿西方现代化经验来硬套中国的实践之嫌，易形成误读。

4 理性与信仰二分，有苗头但相当微弱

《控制论与制度改革》实质上回避了对阶级性的探讨，从而也就回避了科学与阶级论背后的道德意识和权力意志的可能冲突。在“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下，科学与阶级被不加辨析地“统一”在了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如该文为了论证制度调节何以具有科学性，最终还要到马恩全集第 32 卷第 542 页去找依据。^[31]1983 年出版的《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也存在类似现象：“如果从主客体之间反馈耦合角度来分析一下毛泽东提出的认识模式，可以发现，‘实践——理论——实践’的反复循环正好相当于控制论的负反馈调节原理。”^{[32]p179}把黑箱控制论的试探性搜索与毛的实践论的完全等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的完全等同。科学即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的。但不能据此认为科学同马克思主义一样已经成为道德和信仰的基础，不能说就是科学主义——因为最终的裁决还取决于权力，权力如果裁决说某某理论或实践不是马克思主义，那它就不仅不正当，甚至本身是科学的东西也不科学了。如果一定要把 1980 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贴上科学主义标签的话，那也应该看到此时的科学并没有完全明确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并不是最终的正当性依据。

二十多年后刘青峰为再版《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作序，拒绝给新启蒙运动戴上“科学主义”的帽子。她坚持那是一个以认知为终极价值，并希望把认知指向科学自身实现超越后，人获得理性和尊严从而真正成为人的时代，是一个思想还没有被专业取代，呼唤着大无畏怀疑的科学精神的时代。^{[33]再版序言}的确，“借助于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的一些方法，从宏观上认识科学史”，从而使“人类不仅应该用科学光芒照亮自己，还应用它来照亮社会，照亮科学本身，照亮科学发展的道路以及那长期隐藏在历史阴影中的科学和文化背景之间内在的联系”的宣言，^{[33]导言}更接近现代性、科学理性和程序理性中具有根本性的自反精神。刘大椿 1985 年出版《科学活动论》，^[34]顶住科学及真理具有绝

对性倾向的科学知识体系说，力图客观地说明科学只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之一，无疑在支持和深化实践论内涵的同时对物质一元论和预设真理论形成了冲击。

本文认为，作为主要当事人之一的刘青峰强调 1980 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并非科学主义而是科学精神，作为后来成为中国科学哲学领军人物之一的刘大椿也同样强调不能把科学当作绝对的排他性价值，这不仅仅是对当年科学哲学主导“文化热”的一种解释或辩护，也不仅仅是为了指出科学（理性）本身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当时的科学理性具有独立的终极价值地位，尤其是独立于共产主义道德理想的终极价值地位，这是科学能够质疑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因；但最重要的是，1980 年代的科学理性虽然接近于古希腊的认知意志从而成为了超越性的终极价值，但它并不像 1990 年代那样完全排斥其他的道德追求——比如革命道德意识形态，在 1980 年代初停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之后，“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并非权宜之计的套话，邓小平的这个表述也的确表达并鼓舞着中国人对革命理想的美好愿望；在毛泽东思想未被 1990 年代的“躲避崇高”和“告别革命”解体之前，作为伦理价值的革命依然具有与科学同等的地位，只是革命已经由 1977 年前的激情暴力转义为了类似于萨义德（E.Said）所说的“为美好的生活而奋斗”，而且还不与科学相冲突。

科学与革命，在意象均很模糊的情形下，就这样彼此独立却又相互促进地共同推动了 1980 年代的思想和社会发展。今天的学人如果不了解这一段历史的话，往往容易产生迷惑：科学主义往往会产生程式化的种种僵化形式，乃至极权主义的冷酷强制，但为什么 1980 年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化热，却带着一种狂飙突进的激进色彩，甚至显得朝气蓬勃、气象万千呢？答曰：这是因为，虽然不少学者至今仍然把 1980 年代看作科学主义，¹⁵但即或承认 1980 年代是中国第二次科学主义兴起的原因，也要认识到 1980 年代

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真理并不具有绝对神圣的排他地位，其内在的开拓创新精神与另一种终极价值——革命精神，在当时是相得益彰的。虽然可以拿德国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狂飙突进运动来参照性考察1980年代的中国，但狂飙突进运动领袖赫尔德（J.G.V. Herder）的“天才不须规律”在这个时候的中国却绝对不能说是领导性思想，人们在科学的名义下积极地探索自然科学规律、社会科学规律。与学术思想界相互动，执政党在很大程度上支持、肯定、吸收和宣传着这一精神，即实事求是地探索的精神、科学精神、革命精神；在执政党和学界尚处于新的蜜月期的时候，这几个精神的可能冲突被暂时忽略了，它们显得十分地和谐统一，甚至可以说，1980年代的中国臆想出了一种新的伦理追求——科学革命精神。这种科学革命精神，既无暴力革命之反程序的暴戾气息，也少科学主义的程式强制；既类似于西方的理性与信仰二分，但更模糊地蕴含着道德一统的思维方式，极大地影响着政府、执政党和普通百姓的制度设计、执政行为和日常行为。

5 “初级阶段论”的哲学基础是类似于控制论的“干中学”

以科学地实践为基本精神，以试错性探索为基本方针，1987年10月，执政党在十三大上第一次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可以从马列经典著作中找到一些依据，所以在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1982年十二大和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中已经简单提及。胡耀邦在1986年10月筹备会议上提出要把十三大报告写成一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是希望能够结合思想理论界的成果，站得更高地阐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为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找到正当性根据，但又不至于陷入到1977年前僵化的意识形态之中。其基本目的就是“以后再也不要吵着急忙搞共产主义了”（郑必坚语）。1987年3月赵紫阳向邓小平汇报《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

坚持上述思路并明确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理论依据说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说明“在新的实践中进行创造性理论探索的必要性。”^{[35]pp301-317}显然，初级阶段论和“摸着石头过河”渐进策略的哲学基础一样，就是以科学实践为正当性依据的调节控制论。而从温饱到小康，再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对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一个逐步积累渐进过程的定性，^[36]则是这一程序理性的自然展开。

为什么要提出初级阶段理论？赵紫阳在大会报告中说是要为方针、路线和政策明确“根本依据”，并且指出了六条方针和基本路线。方针和路线背后的方法论是什么？邓小平对十三大的定性说得很白很透：第一，“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36]p259}就是要为“摸着石头过河”提供正当性依据，肯定十年来以渐进主义的方式改正激进革命理论的做法，肯定从反省“左”的教训中找到的试错性调节方法。第二，要求和相信新班子把改革政策“连续贯彻下去”，其实质是坚持试探性摸索前进的哲学，坚持已经初步觉醒的程序理性。

“干中学”也曾经是文革中出现过的一个词汇，最有名的表述是号召年轻人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37]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用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语境下，就多了一种探索的科学精神——因为“在实践中摸索前进”、“干中学”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已经表达出了一种去意识形态的普遍心理趋势，但实质上以科学革命道德为正当性依据的意识形态依然是思维的主导。当其时，西蒙（H.A.Simon，一译司马贺）不仅已经多次造访中国并大范围讲学，而且已经在数年前就与中国科学院心理学同行们合作，多次进行结合了“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和“例中学”（Learning from examples）的“示例学习”（Learning from examples and by doing）研究。^{[38]pp42-49, 167-169}

西蒙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还只是一个开始，¹⁶以初级阶段论的第一次阐述为标志，倒可以对执政哲学做一个阶段性小结：拨乱

反正之后，经过数年“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探索，执政党已经去意识形态化地彻底放弃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企图，形成了含有科学精神的社会渐进发展哲学。这套发展哲学实用主义地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的需求为目的，常识理性地以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渐进改革为手段，程序倾向地以规范性的法律制度为保障，具有一定的程序理性。但由于实践年数尚短，渐进改革中具体的程序化办法积累得还很不够，程序理性还极不成熟；再加之对目的-手段之关系的理解过于简单，很容易导致功利主义的工具理性。但无论如何，以科学实践为正当性依据，已经迈出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关键的第一步，略显粗糙的试错性探索前进的执政哲学开始萌芽。

简单反思一下这株嫩芽，当然有一些疑问：1) 这套哲学从根本上来讲，不就是辩证法已经讲得很清楚的质变量变规律吗？扯上控制论，是不是科学主义作祟？毛泽东用实践论谈得很清楚的问题，还有必要用常识理性、程序理性来解释吗？2) “摸着石头过河”就一定合理吗？“跑着过河”、“跳着过河”为什么就不行？

历史无法假设。空泛地讨论激进与渐进，也的确分不清孰优孰劣，甚至搞不清什么是渐进，什么是激进。大跃进和大民主的实践，把飞跃（跃进）和质变划等号，实际上是把结果与过程相混同。而理性地分析之后就会发现，质变的结果是可以通过飞跃和渐进两种方式（过程）实现的。飞跃和渐进的区别，不在速度的快慢而在中间过渡状态是否稳定。^{[39]pp129-157} 早点进入共产主义，是一个善的愿望；踏着彩虹桥过河，也不失为一个美好的理想。这些愿望和理想，就是中国所希望达成的善和美的质变。这些愿望和过程没有实现的原因，要么是忽视或轻视了过程，要么是选择了不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总而言之是理想主义在中国的现实中碰了壁。浪漫主义如果缺乏经验主义的支撑的话，其失败是迟早的事情。

所以，激进不是字意上的速度问题，而是说明旧的理论体系对过程的研究及其哲学思考相对阙如，而控制论正好可以弥补这一薄弱环节。陈云要求慢，邓小平要求胆子大一点，这些都不是根本分歧，因为他们的共同点“步子要稳”更重要——都强调过渡的过程要稳定，强调扎扎实实地落实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虽然说（结构和过程）的稳定也并不是一个完全明晰无歧义的概念，但渐进的精髓，也正在这个“稳定”，在于对目的和过程都没有确切的信息可以分析把握的时候，通过试探性地摸索调节自身，以保全自身为发展的基本前提，一步一步地、有程序地稳步前进，而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慢。¹⁷虽然 1980 年代的新启蒙运动颇有些狂飙突进的味道，但执政党却一直重视“稳”。如果认定了程序性发展的正当性，那么就会很自然地反对任何激进主义，而不管你是激进革命，还是激进自由主义。

中国有着浓重的程式化传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程式理性，但由于受制于权力和道德而并不独立。在摸索“初级阶段论”的头七、八年实践中，凭借控制论带来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常识理性得以苏醒。虽然“四个坚持”使得这种理性没有完全获得独立地位，但它在去意识形态化的趋势中，在科学理性独立于宗教理性的启示下，毕竟与程式理性有所不同了。这种新的常识理性，就是蕴含试错探索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程序理性之萌芽。

III 从市场体制改革到经济理性地纲领化和自为地程序化

改革中的中国这艘巨轮，在 1970 年代末调整航向后，虽然不乏精神污染、人道异化和自由主义等争执，但矛盾没有扩大，十几年的航程基本上可以用有声有色来形容。

1 从“动乱”的“六四”到“告别革命(意识形态)”的南巡讲话

1989年受“国内国际气候影响”发生的“动乱”被镇压，新启蒙旗手被舵手撵下船去，自由主义一时间噤若寒蝉，执政者完成了对激进右翼的歼灭。但激进左翼要把航向拉回到改革前的言行，却也只是昙花一现地喧嚣了一两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把这一只激进力量也弹压了下去。“六四”的结果之一，居然是两个激进在意识形态上被明确抛弃，并最终在稳定的基础上确立了秩序的正当性价值，¹⁸把稳定的秩序和政策的连续性当作了社会行动（制度）的正当性依据。这是与执政党思维接近的新权威主义转型为新保守主义的重要哲学根源，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认为苏东剧变是一个失败并且以之反衬中国渐进改革的成功性和正确性的重要论据。

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苏东剧变其实有不同的观点和想法。若以自由和民主为高于暂时混乱的价值，那么苏东剧变就不仅不是一个悲剧反而是一次伟大的胜利。通过大乱形成了新的民主政府，毛晚年未能通过“文化大革命”达成的夙愿，在苏东不是获得成功了吗？苏东政治体制巨变如何评价暂且搁置，但巨变的确按照激进的方式达成了巨变者的愿望，仅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就不应否定革命思维下的激进主义从而简单化地认为渐进优于激进。这既不是以理服人，也不符合历史给人类的教益，不是真正的辩证法。激进与渐进，都要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适应性地权变。比如分析苏东剧变在经济方面的原因，公认的看法是这些国家经济改革的步伐不是太激进，而是太保守：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改革总处于零敲碎打、修修补补的状态，经济萎靡不振导致民众对政府不满。执政党受到攻击被迫下台时，民众居然相当沉默和无动于衷，就因为执政党已经丧失了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邓小平显然也赞同这一看法中的合理因素：“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所以苏联解体一个月后，

他就开始南巡并发表讲话，全面阐述其关于改革和发展的执政理念。

1992年春的讲话有三个要点：1)继续“大胆地试”，也就是坚持1978年以来解放思想下的试错调节方针：“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而且还可以“慢关”，“可以留一点尾巴”。熟悉中国政治话语方式的人，不难理解其中对“错误”的容忍程度是何其高矣。大胆当然代表了激进，但在邓这里它与控制论的试错性前进并不矛盾：“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就是这种高速度的循序渐进。

2)高速、大胆和激进，不能和“左”划等号。因为“左”在中国除了有冒进的内涵，还是一项大帽子——它“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但“‘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为了防止改革开放这个好东西被搞掉，中国“主要是要防止‘左’。”^{[40]pp370-375}这一席话基本上给“左”判了死刑，并已经隐晦地把道德从正当性依据中清除了出去，这可以说是去意识形态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左”的革命色彩，显然指的是那些自诩为革命的道德和理想，也就是李泽厚批评的那种泛道德主义——与邓小平几乎同时，李泽厚在大洋彼岸的丹佛发表了“告别革命”的宣言。^{[41]pp148-162}联想到王蒙经常称赞1990年开始走红的王朔的“躲避崇高”，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但颇能说明那几代人对所谓革命道德的态度。去意识形态之后的道德真空，对于我们理解这一时期的程序理性的特点非常重要。

3)不争论，也就是不争论姓社和姓资、计划和市场，这是执政党第一次如此明确地表达去意识形态化的理念，影响深远。向右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存在悖论，向左的道德意识形态随着理想的幻灭而幻灭。去意识形态、去政治的“不争论”，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但又蕴含着乐观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最简单、最质朴的生活哲学。“少谈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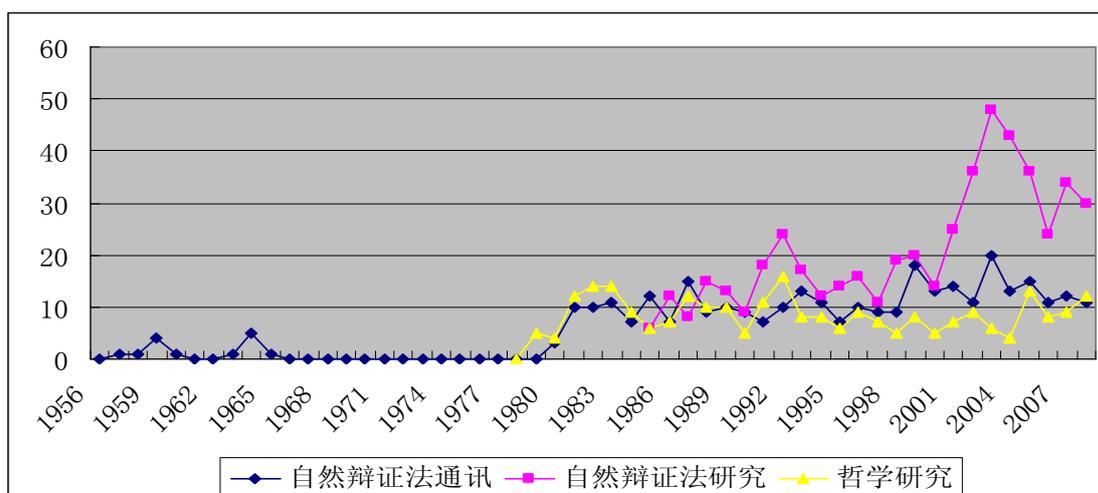


图 2 科学哲学类核心期刊中“波普”全文检索年篇数

多解决问题”，实际上就是不要相信什么预设的真理，而要多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通过摸索消除一个又一个的错误，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从而一步一步地前进。邓小平没有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去写文章系统论述这些问题，但学者们却发现这种行为背后确有理论依据。这个理论，就是对历史决定论进行批判的波普尔的“渐进社会工程”，即进行局部的、不断尝试和不断改错修正的社会改革。

2 渐进主义吃饭哲学对休克疗法自由主义的经济胜利

改革的目标就是创建合理的制度和程序：“即使它们做错了，损失也不会很大，而且要再调整也不难。相反，整体性的改革看来目标宏伟，坚定不移，实际上却常常导致粗陋，混乱和倒退。”^[42]显然，渐进社会工程的哲学基础，就是波普尔本人以猜想与反驳不断证伪的科学演进模式表述的基本哲学观点：批判理性主义，它也是一种程序理性。

同“控制论”一样，波普尔及批判理性主义早在 1950 年代就被译介到中国，也同在 1980 年代初期形成热潮。^{[43]p388}不同的是其魅力更为持久，并且基本上没有陡升陡降大的断裂性起伏。理性的探究和融入是一个要更花费时间的锤炼过程，何况这还

是一种批判理性。从图 2 的数据，尤其是《自然辩证法研究》显示的折线图来看，它在 1992 年左右和 2002 年前后又先后掀起两次高潮。2002 年的高潮除了与中国模式的探讨有关，再就是纪念波普尔诞辰 100 周年。而 1992 年前后的这次高潮，则明显与“休克疗法”有关。

如果坚持彻底的批判理性主义，那么开放社会的敌人就不只是倾向暴力的极权主义，而是还有另外一个敌人——存在悖论的自由主义乌托邦，其有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俄罗斯在 1991 年到 1992 年全面铺开的改革方案：“休克疗法”。该疗法在 1980 年代中期治理玻利维亚经济危机中发挥了神奇功效，但在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中却水土不服。同时，东欧国家的类似“革命”也宣告失败。虽然从逻辑上讲，“休克疗法”的失败并不能证明这种方法的彻底错误——1996 年还有人撰文暗示 1992 年底的失败是暂时的，“休克疗法”为东欧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44]pp37-41}但本文认为这毕竟更接近于一种“历史在较近的短时间内不能轻易下结论”的书生气。从俄罗斯一直到 2000 年还深陷经济泥潭，其后虽靠着石油出口有所好转，但在 2008 年经济危机导致油价大跌后又陷入困境来看，“休克疗法”对俄罗斯的中长期发展也无益。

“休克疗法”在 1992 年底基本告败，俄罗

斯在 1994 年 2 月国情咨文中宣布放弃“休克疗法”，叶利钦 1996 年大选时承认“过去在改革中试图抄袭西方经济的做法是错误的”。这些都更加坚定了中国对渐进改革执政哲学的信心，并于 1997 年十五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45]报告通过总结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通过重复邓 1987 年“在干中学”的那一席话，否定了左派在会前提交的“万言书”，肯定了“在实践中摸索”出的中国模式及其背后的方法论。如果说，1987 年只是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什么样的状况，1997 年则还指出要在这些细分的 8 个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按照一些纲领性的规定逐步实现 8 个较为明确的细分目标。这就不仅把目的，也把过程进行了初步区分，并且规定了在这些过程中进行的摸索要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即纲领。所谓纲领，就是原则性的方法，方略性的程序。这样，程序理性不仅表现为渐进性和试错性，还要求这种试探性搜索从杂乱无章的状况上升到有一定的秩序性，予以纲领化。纲领化是为了避免无目的地“盲人骑瞎马”，避免无序地“夜半临深池”，拒绝无原则地“脚踩西瓜皮”而使摸索更有效率（工具合理性）和效果（选择合理性），使行为合韦伯和哈贝马斯（J.Habermas，一译哈伯马斯）所说的目的理性，^[46]合施路赫特所说的科学-技术理性。^[47]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纲领之所以具有这种程序理性，与 1990 年代复杂的科学主义有着深刻的思想联系。

3 “躲避崇高”的无信仰科学主义与以科学本身为信仰的科学主义

1990 年代的科学主义，不同于目的理性与价值关怀的二分，它具有两种类型：一是以科学本身为信仰的科学主义，一是摒弃任何信仰——包括科学的科学主义。两种类型的科学主义，都不相信其他任何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

由于受霍克海默（M.Horkheimer）对工具理性批判的影响，许多中国学者忽视目的理性中的选择合理性而仅注意到了其中的效率合理性，并以西方工具理性的扩张来比附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批评这种偏重经济的改革导致道德和人文沦丧。这有一定道理，但在精妙处显出了纰漏。西方即使在工具理性最嚣张的时候，也还是有某种终极关怀的价值理性的。韦伯现代性不仅指出了目的理性的扩张，更根本的是通过目的理性的界定使“终极关怀与理性表现出二元分裂的状态”。理性独立于信仰，这样即使信仰破灭也不会干扰理性，“理性也可以稳定地成为科学、技术、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基础而不会对信仰和道德造成颠覆。”^{[48]p7}前已述，1977-1989 年的中国，科学虽然已经成为正当性依据，1987 年甚至还出版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以批判马克思主义，但总体而言科学理性与共产主义（道德）是含含糊糊地捆绑在一起的，有二分的苗头但并未明确二分；有去意识形态的倾向但尚未摆脱完全道德意识形态。

1989 年之后情况发生变化：三个“有利于”不仅是社会主义的判断标准，而且还是一切工作是否正当的标准。三个有利于中的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最后一项生活水平虽然涉及到人，不能说没有人性关怀，但的确相当模糊，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下难免只有“物质”不见“文化”，这是许多人把邓小平理论定性为实用主义的主要原因。科学虽然依旧是正当性依据，但 1980 年代的科学精神却在 1990 年代经济理性的强势冲击下开始变异。综合国力和生活水平，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到生产力，落实到生产效率，这就容易导致经济学帝国主义下的科技工具论。像泰罗虽然有分享公正的人文精神但程序化的科学管理却成为“血汗工厂”的效率工具一样，^[49]知识分子虽然在争论人文精神，但在漠视终极关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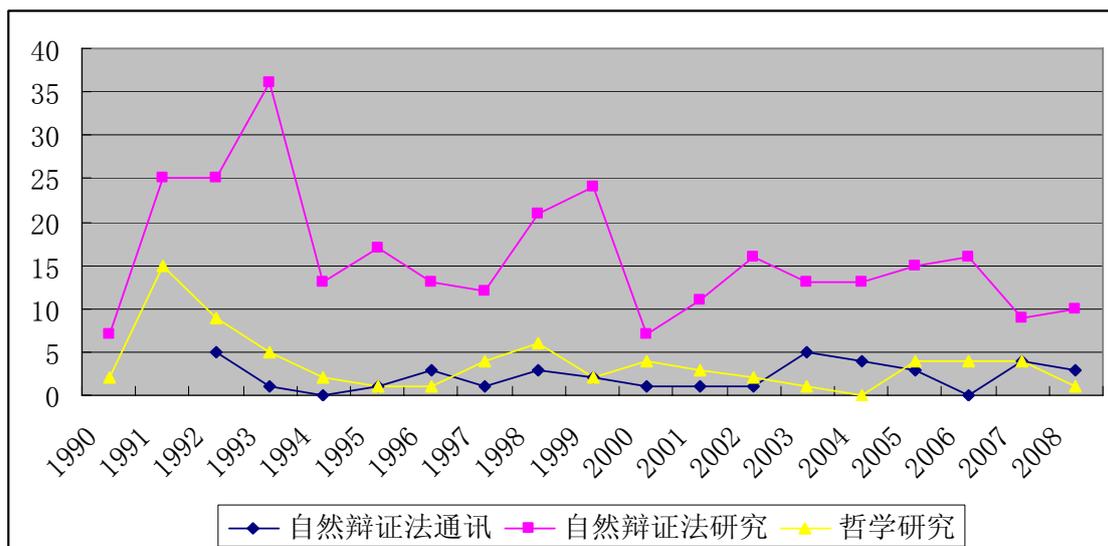


图3 科学哲学类核心期刊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全文检索年篇数

实用主义下的科学技术却成为提升效率的第一生产力，确切地讲这不是工具理性而的确确就是科学主义，是取消一切信仰的科学主义。

邓小平 1975 年复出时提“科学技术是直接生产力”受到批判；1978 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终于确立了科学的“正当性”地位并靠着科学打破意识形态的缺口，打开封闭的国门对外开放。^{[50]pp388-405} 1988 年 9 月邓小平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92 年南方讲话再次提到这一论断，只是更加强化了把科学当作天然正确的、当作社会行动天然的正当性依据的常识理性、实用理性，而并没有跳出把科学技术当作工具的思路，所以称其为工具理性也有一定道理。但西方即使在工具理性泛滥的情况下，也还有一个与理性无涉的上帝的存在，有一个与理性互相独立的终极关怀存在。在邓小平的解释里不可能看到这些东西，社会上以躲避崇高为荣，2001 年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反证出整个 1990 年代道德高地基本失守。

在科学哲学界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早期论述（1992 年前后的高潮期，见图 3）也还很少涉及这方面内容。这些文

章大多关注的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内涵是什么，创造何种机制以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现高科技与经济的互动以及科技人才培养等问题；^{[51]pp57-62} 而没有像世纪之交那样多元，既有从社会变革的实践回应现代科技革命的宏观角度、^{[52]pp64-97} 也有不少文章从批评科学主义的视角来看待这一命题。

知识分子并不都是甘于沉沦的，1990 年代中期，如果说还有科学主义的话，那么无信仰的科学主义与以科学为道德和信仰最终正当性根据的科学主义是并存的。邓小平南方讲话所云“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53]p382}，大致可以列入后一种科学主义。而且，后者所说的科学还不是预设绝对真理的科学，而是承认科学规律为相对真理的科学，即批判理性主义的科学主义。渐进社会工程的纲领化，程序理性的初步成长，就发生在批判理性主义的背景下，这也是波普尔在中国持续受到关注的重要原因。很难说是波普尔改变了中国，还是中国选择了波普尔，最好把两者理解为一种思想的互动。

比如，顾准 1970 年代中期写作的《科学与民主》，曾经发表在 1980 年代中期的《读

书》杂志上，并不是特别引人注目；顾准坚持的彻底经验主义，本来是 1980 年代的话题，但 1990 年代中期才有顾准的再发现并兴起“顾准热”，的确大有意味。《顾准文集》不仅表达了科学比民主之类的终极目的更为基本的思想，而且敢于站在经验主义的和多元主义的立场上质疑乃至批评教条化了的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主义“至善”这种终极目的。^{[54]pp346、374-375} 对错暂且不论，这至少表明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当中，已经将科学超越于某种制度和道德意识形态，而把科学本身当作了唯一的终极价值。

当然，和刘青峰、刘大椿一样，顾准不仅与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在论证方法、批判对象上完全一致，也还把科学的怀疑和批判精神贯彻到底，贯彻到科学自身，并不认为科学绝对正确无误，^{[55]pp374-375} 更无畏地体现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怀疑和批判的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纲领只有融入了这种科学精神之后，才具有了理性和系统的哲学基础，才有可能将循序渐进的改革方针上升到程序理性的哲学高度，而不仅仅是与“休克疗法”做一个简单的效果比较。一拖十年，原拟紧随《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出版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终于在 1999 年得以面世。这意味着，对波普尔证伪主义和渐进社会工程的借鉴性接受已经不仅局限于知识阶层而开放到了包括执政党的整个中国社会；道德理想主义所构建的“文化大革命”道德乌托邦直到这一刻才彻底坍塌。由此不难看出 20 世纪末中国的科学哲学和执政哲学基本完成了批判理性主义的程序理性转向的结论。换言之，以科学为正当性依据，已经初露出了以程序理性为合理性标准的端倪。但此时，科学的意象依然是模糊的，程序理性的意蕴是相当含糊的，有可能被滥用或误用。

4 制度经济学的常识化兴起和程序理性的实用化自为

从西方现代性的演变来看，科学主义的程序理性一旦确立，就会倾向于操作主义地由自在走向自为，走向形式主义的程式强制。^[56]这也是韦伯合理化理论最主要的命题——“目的理性行为的制度化”^[57]或曰“理性化过程在政治及其他人类组织中的表现”的“官僚化”^[58]的具体展开。表面看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诱发文化层面的经济理性推动制度层面的程序理性的政治民主进程，与之类似。比如，在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纲领的同时，十五大报告还宣示了一个重要的治国方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句话首先出现于 1996 年《“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发展目标纲要》；1997 年重现；1999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原封不动地照抄。^{[59]p342} 法学界人士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目的是以制度建设推进生产力发展，保障和固化改革成果。^{[60]p397} 市场经济催生经济理性，而人和组织的经济理性觉醒后必然会要求其利益得到可靠的保障，这就是契约和法律的诉求。用“依法治国”将具有准程序理性的“初级阶段论”予以纲领化、¹⁹制度化的历史，大致体现了这一逻辑。

但把历史的视野稍微放大一下，就会发现对上述逻辑也不能僵化地片面理解。且不论 1950 年代就开始的有别于苏联模式的道路探索，单说 1980 年代，程序化制度改革在思想理论、经济和政治三个领域，虽然不那么广泛和扎眼，却已经在实实在在地互动进行了。^[61]上文谈到的控制论与制度的关系，就是一个证明。图 4 关于制度经济学的年著作（含文章）数，也颇能反映“权利结构的理性化与文化的理性化”^[62]（科学哲学渐渐从中心到边缘，但科学意象通过经济学和法学帝国主义依然体现在文化中）的互动。而“初级阶段论”提出后 1988 年的小高潮和随后的低谷，199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出后著作数马上跃升超过 1988 年的水平，并在其后一直持续走高，极其生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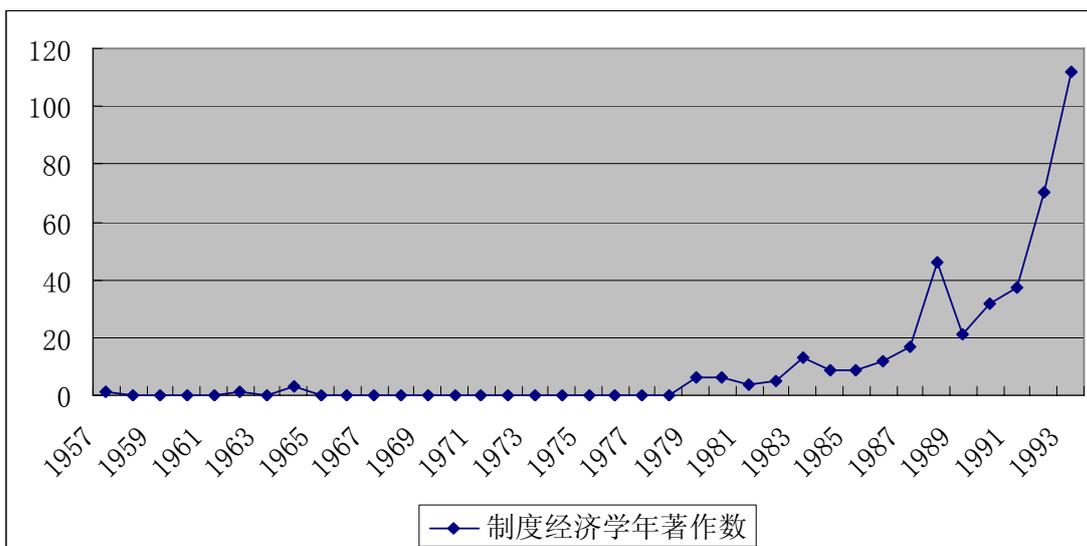


图 4 人文社科学献中“制度经济学”全文检索年著作数²⁰ (1957-199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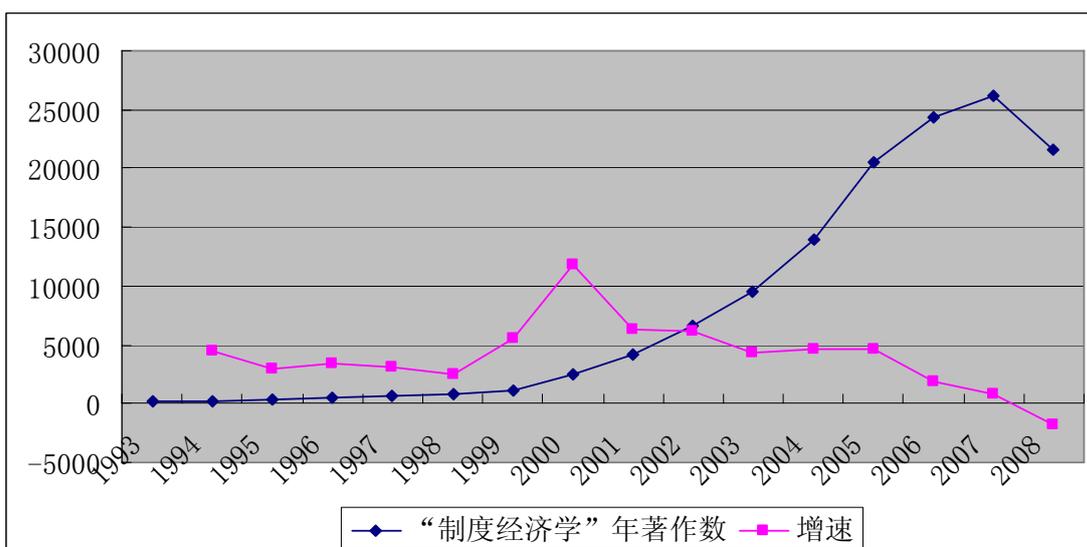


图 5 人文社科学献中“制度经济学”全文检索年著作数 (1993-2008 年)²¹

反映了政治气候和政治权力的变换对关于制度的学术研究的影响。

学术界的这股热潮，反过来也反映了民众乃至执政者的关注热点。制度者，以程序理性为根基也；而辅以经济，虽不能绝对化地做物质化、庸俗化理解，却也表明了实用主义的过分猖獗和道德理想的过分阙如。2002 年，被外界称为技术官僚的当政者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宣示“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

程序化。”^[64]西方社会用至少 400 年时间建立起来的程序化科学管理的科层官僚制度，^[65]这么快就被中国接受了吗？这里的制度和程序，如果仅仅是基于对科学的常识性理解而做出的实用主义解读，那就必然与西方原汁原味的科学管理和程序化管理存在差异。

科学管理之所以能被德鲁克 (P.F.Drucker, 一译杜拉克) 誉为能与马克思主义比肩的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的两大思潮之一、并被贯彻到二十一世纪的知识管理

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程序性这些深植于西方文化中的哲学思想。

^[66]这些都不是具有自身独特文化传统的中国在短时间内可以拿过来就用的。对于系统、科学和程序，中国人自有自己的传统资源和现代理解方式，它们未必都与西方的程序化管理精神相同。程序化地“依法治国”，一个“治”字表露出“三个代表”的先进性政治精英对权力理解的底色，相对于西方个人主义要求通过程序达成契约，这里的程序更多地体现为自上而下的权力用来治理国家的工具，更偏重于实质理性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程序本身的民主价值，程序正义中的程序民主，在依然以实质性内容为正当性判据的中国，除了以季卫东为代表的部分（新）程序主义知识分子以外，还处于普遍受忽视的状态。

只是被贯注了科学性而缺乏民主性，这样的程序理性当然是很不完整的；而被贯注的科学性是一种杂糅了去意识形态无信仰和以意向模糊的科学本身为信仰的含混的科学主义之后，这样的程序理性就更加显出了不完成的弊端。这种程序化的自为，较之西方操作主义下的程序强制，具有了更复杂、更含混的反道德、反理想色彩。缺乏伦理价值的程序化，或许能兴盛于一时，但必然是不得人心的，也就必然不可能长久。不过，中国的程序化进程既然已经按照自己的方式启动，程序理性既然已经进入到自为的阶段，它就会作为一种强劲的实力不可遏止地发展下去。从西方的教训来看，工具理性的盛行一度导致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式化的程序以秩序的名义压制个人的自由，束缚人的自由发展，甚至使人异化。中国的程序化发展，能够成功地规避这些现代性困境吗？执政者又是采取何种方法进行规避的呢？这种规避的方法有效吗，它带来了哪些积极或者消极的效应？这些效应对程序理性乃至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IV 程序化行为在科学发展观下的多元化解读与程序理性的复杂性前景

1990年代，在民众对各种意识形态强制感到厌烦的时候，“去政治化”（借用汪晖语）“不争论”顺乎民意。但21世纪初以来，社会出现了道德真空并导致民怨声起，被指责为技术官僚或者没有理想和理论的实用主义，这是任何执政党都不能漠然置之的。如果说还要坚持“不争论”和“韬光养晦”的小平遗训的话，那也至少要表明自己的主张和哲学。以上就是科学发展观产生的历史背景。以意象模糊的科学为信仰，已经被证明是靠不住的；科学发展观，带来了哪些新东西能够让人觉得可靠可信，从而纠科学主义之偏，将程序理性和中国社会引领到一个健康的轨道上去呢？目前看来，局面相当混乱，前景还相当的不明朗，甚至有复古为道统一体化结构的可能。以下试述之。

1 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以科学为正当性依据

科学发展，从字面上讲，是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的综合；从内容上讲，发展、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和统筹兼顾等，^[67]也是1978年以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早就耳熟能详的一些概念，其中统筹兼顾甚至还是1957年毛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有的提法。^[68]批评者说它了无新意，党内理论家辩护说是一脉相承。这样说来，科学发展观本身倒是的确体现了尊重前人劳动成果、持续性发展的反激进精神。新意当然不限于此，尤其关键的是加上了一个“观”字，那就要强调其理论基础、哲学属性了。因为这里的观，不仅仅定位于普通人的普通的观念，它明确宣称自己是具有相当程度普遍性的自然观、历史观、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系统的哲学观。

“第一要义”的发展，本质上是有质量、有内容地行动和前进。所以在本文看来，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为“摸着石头过河”的试探性搜索前进、到反一蹴而就激进观

的“初级阶段论”、到初级阶段的行动纲领、到民主政治的程序化展开这样一个程序理性不断提升的发展过程寻找最终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依据，确立执政哲学基础。而在发展之前冠以“科学”二字，则表明这个最终依据，就是 1977 年以来就已经成为正当性依据的科学。只是以前尚处于隐而不宣的状态，这一次明确予以正名，使得科学能够与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等并列，并且还有可能以最新的、与时俱进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名义对上述理论有所超越，不能说没有勇气和意义。2009 年 5 月，“六四”二十年之后的又一个春夏之交，执政党郑重其事而又大张旗鼓地推出《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在论证第一个“为什么”，即“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时，邓小平 1992 年所说的“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被再次引以为论据。^{[69]p3}

但作为合理性标准的科学究竟是什么呢？这是一个科学哲学界内部也争论不休并且迄今尚无确切答案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对此并未作正面回答，这也就为容易受意识形态干扰的人们对科学和程序的解读提供了多元化可能空间。冷溶和李君如等一直认为，科技革命是执政党面临的最大机遇与挑战。为什么这样说呢？本文认为，科技革命的基本工具和基础平台，就是日新月异的计算机程序所形成的巨复杂的程序化网络体系。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基础是信息化，信息化的根本是程序化。知识管理无论翻出多少花样，最根本的精神还是秉承与泰罗科学管理的程序理性。比如，2008 年开始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有分析认为是原有信用体系的崩溃，本文认为另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制度落后于技术，尤其是没有以权变的程序化因应日益程序化的信息技术对社会产生的深刻变异影响。这提示我们要对程序化作出紧跟时代的思考，做出新的解读，尤其是思考如何

使人为地程序化能够更好地为人的生活方式提供新的选择。如同科学一样，程序化也是一柄双刃剑，程序理性也有自身的局限性，这是新世纪的中国科学哲学和执政哲学都还没有研究透彻但的确紧迫的新课题。

在科学重新开始成为正当性依据不久的 1980 年代中期，刘大椿在《科学活动论》中论述过科学的两面性，当时应者寥寥。1990 年代，随着《中国 21 世纪议程》以可持续发展复兴自然哲学并发展出一门蔚为壮观的生态哲学，人们对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也回到恩格斯对自然的胜利和自然教训我们的思路，并在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的讨论中使认识在保留分歧的状况下渐趋客观和多元。但科技双刃剑如何运作，科技在何种情况下有益，何种情形下有害，却没有得到细致深入的研究。

由于传统程式观的束缚，更重要的是受科学主义导致的极权主义强制之苦的记忆还十分清晰，国人的程序理性来自对科学的常识化、实用化解读，这就难免存在中国特色的偏见：在一开始的时候，人们大多没有认识到程序具有适应性权变的弹性，而把它与僵化的程式混同，把程序看作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根源。随着“摸着石头过河”到程序化执政的不断发展及其在经济上的成功，人们才逐渐认识到程序的合理性，并首先认识到科学性的程序行为能够带来效率。程序化的公正和公开价值，近年来也渐渐为部分人所接受。总体上看，对于科学哲学和执政哲学来说，对程序化价值的全面认识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渐进过程，且尚未完成。

2 程序化的科学与民主内涵及其“中国特色”的多元解读

2002 年执政党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民主政治时，同时还提出“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实际上已经指出了科学化和民主化都必须靠机制中的程序来落实，这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了程序

理性的科学与民主内涵，认识到了程序化的科学与民主价值。2004年执政党专门召开中央全会讨论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在重提“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重提“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的基础上，新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70]。涂明君一度乐观地按照《程序化的哲学阐释》的逻辑，把这个新论断想当然地归结到了程序化执政的落脚点；并且根据江西铜业将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引入党建工作、湖南省实施《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案例，得出政府过程理论和程序主义已经与中国程序化建设相结合，^[71]用机制创新来解决“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矛盾的凸显期”^[72]这样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新形势下“改革攻坚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73]系统完成体制建设和制度改革。倘若果真如此，那程序理性就基本健全、执政哲学就基本成熟了。

可是，稍微放眼扫描一下中国社会的现状，就会发现与现代程序有太多的抵牾。局部的程序化实践是有的，但总体而言却未必尽然；从有科学性和民主性推出具有程序理性也是基本无误的，但如果这个前提出了问题呢？换言之，如果对科学和民主的理解是含糊的或者有歧义的，那么这个程序理性还可能是清晰和确切的吗？逻辑上讲不大可能。实际的问题是，这里（执政哲学）理解的科学，未必是科学哲学理解的科学；执政哲学理解的民主，未必是政治哲学理解的民主；而且，无论中外，科学和民主是现代和近代以来相互有着内在关联的两大精神，科学哲学颇关注民主问题，政法哲学也对科学不无见解，它们之间也不无分歧。

制度经济学研究延续着2002年的热潮，2006年开始放缓增速，2007年进一步减缓，2008年则出现负增长。其中可能有2008年数据不全的原因，但2006年以来热度渐减却的确是一个趋势。其中可能有任何学术热点研究本身不可能永远不退热的原因，但本文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则与“以人为本”成为正当

之后兴起对“制度拜物教”的批判更相关联。总体而言，政法学界中越来越多的学人开始关注并肯定程序的正面价值，但新程序主义的声音有多高，法学界批评程序主义的声音就有多高，而批评者却很少意识到批评对象所说的程序并不是自己定义的那个程序。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都受到类似的意识形态影响。比如，对经济学帝国主义和法学帝国主义的批判，近年来势头渐猛。其中表现尤为突出者，是利用现代互联网和民族主义相结合的强大力量重新崛起的新左派，它们融合了西方20世纪后期极为强势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确很有学术功力，不像老左派对渐进改革和程序发展的批评那样空洞乏力，而是的确切中了要害。这也进一步导致了科学意象和程序理性的多元化解读。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是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内容，是批判理论；批判理论的兴起，就是要复兴马克思主义的人道观。霍克海默正是从对制度钳制人的角度展开了对工具理性的猛烈批判的；马尔库塞（H.Marcuse）则直接把技术对人的异化描述为单向度的人。福柯（M.Foucault）以知识考古批判规训的理性，德里达（J.Derrida）则完全地“去逻格斯中心主义”彻底地反理性。《程序化的哲学阐释》描述了西方程序理性在科学主义下经由操作主义-行为科学-管理学-政治学实现对社会程式化强制的路径，从而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合理性。但该文认为德里达等固然切中肯綮，但自身却并没有完全摆脱知识和理性的境域，甚至还要利用科学和程序的方法来进行论证，说到底还是没有跳出从康德（I.Kant）《纯粹理性批判》意识到的理性的局限到布里奇曼（P.W.Bridgman，一译布雷治曼、布里齐曼等）《事物即方法》（The Way Things Are）所说的“咬尾之猫”的思维闭环。^[74]

就像康德和布里奇曼不曾动摇对理性和科学的信仰一样，《程序化的哲学阐释》受哈贝马斯的启发——虽然批判目的理性导致的

制度化扭曲了交往沟通,但最后还是“重振理性雄风”以程序性的互动协商改善生活方式,结合复杂性研究和知识管理研究成果,提出对程序化可以有一种在容纳对程式化批评意见的基础上超越程式化的协同互动的解读。但这个协同超越的新程序化动环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该文并没有给出清晰的图景,它只是提供了一个原则,并表达了应该自觉其局限地肯定程序、理性、科学和知识的正面价值的立场。^[75]刘大椿 1987-1995 年间提出《互补方法论》,指出程式化的努力和以费耶阿本德(P.K.Feyerabend)为代表的反规则的“怎么都行”应互补地运用;^[76]2008 年进一步提出正统(标准)科学论与另类(后现代)科学论的多元化共存。^[77]这一扩展科学论的尝试当然会影响到对科学意象和科学总画卷的描述,但具体会产生何种影响?落埃未定;这种科学意象的变迁又会对执政哲学产生何种影响?前景不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科学与人文、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将会得到越来越多领域的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在主流意识形态以科学为正当性依据的中国,更是如此。

和科学一样,民主也是 1977 年来制度的正当性依据,甚至历史更为悠久,超过八十年。^[78]虽然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它只是对广大人民而言的一种要付出痛苦代价的、有条件的制度,^[79]它依赖于一定的程序并且这种程序还有可能被独裁者所利用;民主当然也可以被理解作为一种终极关怀,但如果把民主作为一种普世价值,那就会受到批判——不能草率地把这种批判扣上“左派”的帽子,因为就连波普尔也早就论证过“民主悖论”;再加上民主前面还可以加上一些定语,诸如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之类,这就使得民主的正当性大打折扣,远没有科学那样理直气壮。

正当性强度接近科学的,是人民民主;在科学发展观下,人民民主的后设层面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合理性标准——以人为本。就其目的而言,以人为本与“为人民服务”并没

有什么不同,但科学发展观之所以这么讲,是想体现出自己是有思想和理论基础的,是有文化和哲学底蕴的。执政党在异化人性的物欲追求和效率理性受到广泛批评的时候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首先就是表明了一种对人的价值的尊重。这也就要求社会从金钱拜物教的单纯物欲中解放出来,要重建公平的道德观和回归人之为人的人文精神。而人要想有尊严的存在,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权利并且能够表达自己的权力诉求,这也就是民主。所以,以人为本的提出把民主问题分解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权利权力和人文精神。有意思的是,在谈到民主和人文的时候,不仅顾准,几乎所有的中国学者总是把它与科学相关联,要么对立化,要么统一化,总之是又回到了科学的问题上来。这或许也是执政党用“科学发展”来概括其执政理念的一个原因吧。

3 科学的人文精神能作为新时代的新道德吗?

199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之间最为激烈的思想交锋,除了激进与保守,就是“人文精神”,但在 1993-1995 年间“未能深入”。90 年代后期,与上述两大交锋均有纠葛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大型论争,再次触及人文精神的核心问题:公共性与公共关怀。^[80]1999 年,孟建伟《论科学的人文价值》在批判反科学和非理性人本主义之片面性的基础上,论证了高科技在知识经济中的人文意义和科学的文化价值,提出科学精神本身就是一种追求自由的人文精神。^[81]在新左派和后现代主义兴起的时期提出这一观点,既为科学正名,也以科学精神填补了道德真空,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批判。2000 年,刘大椿《在真与善之间——科技时代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系统讨论科技与伦理的关系问题,^[82]要解决的就是科技革命导致人的交往实践复杂化,进而导致道德问题复杂化之后如何建构以及建构什么样的新的道德规范的问题。对于世纪之交开始网络化和全球化的

世界和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其实，邓小平 1992 年南巡讲话的时候就指出，1990 年代初必须注重效率，但到世纪末的时候就一定要突出解决公平问题。^[83]这让人不能不佩服邓小平的深谋远虑乃至和远见卓识。当然，邓预见的只是关于效率理性扩张到一定阶段后必须解决公平的伦理问题，这只是刘大椿所关注的科技伦理问题的一个重要部分，科技革命带来的新道德问题，显然比这要繁杂得多。所以，2001 年 1 月，在“依法治国”形成共识、制度经济学迅速升温的时节，江泽民提出同时还要“以德治国”，^{[84]p200}虽然暂时在党内外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许多干部搞不清到底是法大还是德大，但在执政哲学上却是抓住了时代脉动的主旋律。在目的理性发展到过分实用主义的制度理性的阶段，在经济理性下的效率诉求达到高峰导致缺信无德的时候，不提道德建设显然极其不利于社会进一步的健康发展，不利于政权的稳固——没有道德正当性的政权历来得不到百姓的支持，西方如此，中国尤甚。但中国又没有西方那种理性和道德二分的传统，这样把法治和德治互相独立地分列，显然也不符合中国人对政权和道德的习惯性理解。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充分清晰地阐释，在观念上的冲突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就会造成思想上乃至行动上的剧烈冲突。

按照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与社会制度合一的”“一体化结构”^{[87]p20}，解决的办法很简单，也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后设层面的科学标准的合理性，把经济和法制的科学性和伦理道德的科学性统一起来。2001 年底，吴国盛发表《科学与人文》，在廓清两者的联系与区别的基础上，主张弘扬独立、怀疑、批判、无畏、献身真理、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精神，并且指出这些科学精神本质上是自由精神，是人文精神。^[85]显然，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吴和孟建伟一样，都把二分的科学理性和科学道德统一为一种科学精神，从科学哲学的细致研究中为执政党建立科学道德

观及这种道德下的社会制度提供了哲学基础。2006 年，胡锦涛提出作为科学发展观中核心价值观的八荣八耻，第三条就是“以崇尚科学为荣”。^[86]

虽然胡锦涛并没有明确说这里的科学是科学精神，但它明确地把科学作为道德价值追求，不仅为科学发展观画出了点睛之笔，使科学从科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的工具手段性解读明确提升为一种价值和精神，而且还为程序化的科学行动提供了一种道义正当性论证，这对于执政哲学来说完全足够了；更何况，它还完全契合中国传统的道德意识形态一体化的思维模式。当然，“八荣八耻”的潜在问题是价值太多，八个核心，的确与社会思潮多元性相当合拍。但科学只能保证它与“八荣”中的人民和诚实是大体和谐的，万一当科学与“八荣”中的辛勤、团结和艰苦之类的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时候，比如科学决策就影响到组织团结、要破坏“和为贵”的理念的时候，又叫人何去何从呢？程序理性与科学具有内在一致性，与其他价值呢？最后也只能由权力裁决了。

4 程序理性在道德和权力统治下的不乐观前景

以人为本带来的权力问题，主要是人民权利与执政权力的关系问题。用什么办法解决呢？科学发展观除了树立科学的伦理价值，还有一个基本内涵是用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解决问题。换言之，科学既是伦理道德，也是工具方法。仔细研究就会发现，科学发展观除了把统筹兼顾作为根本方法，其他地方用到“科学方法”一词时，均为泛称，含义相当宽泛和模糊。唯一的例外，就是胡锦涛在科学院谈到复杂的关系要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去分析解决。^[88]系统科学在 1980 年代是在中国大热的显学，当下则被称为复杂性研究，其研究兴趣也从当年控制论的自动调节转变成对外的自适应和对内的自组织机制。

雷默认为中国模式的政治转型和社会结构，是一种复杂系统的自组织。^[89]这一说法

比较贴切。如果把以人为本的民主理解为“还权于民”的话，那就要给百姓以自主的治理权力，相信他们能够通过程序性协商自组织地管理自己。这样，虽然自组织也会带来组织权力的问题，但程序具有优先于权力的地位。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就试图完成从“管理者中心模式”向“公民权利中心模式”的转变，体现自组织的哲学，把“依法治国”理解为“以法治国”，让自发的、自组织的程序去治理国家。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不断壮大程序理性的自组织能力，丰富和完善“自下而上”的程序机制，应该是一个明确的方向。但这种理想化的方式，在中国实际运行的难度很大，作为一种执政哲学，双向自组织的程序理性能否被广泛接受，或至少起到纠偏减弊的作用，前景相当不乐观。

执政党在当下的现实选择，还是坚持“依法治国”的思路，把以人为本理解为单向地、“自上而下”地精英执政为人民。让“先进的”精英服务于一般的民众，首先要破除心理上的优等生情结，这并非没有可能，但只有两种方式。一是要诉诸于道德，要让政治精英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群众的意愿诚心诚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历史证明这样要求是必要的，但极不充分。第二是商业精英和知识精英的成长为独立于政治权力的、具有与政治精英同等地位的、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精英，只有这样一支能够与政治精英相均衡的力量，才能够真正拿起法律武器保护公共的权力不受权力的侵害，用程序化来分解或制衡权力。这在理论上也是有可能的。但看看国学、阴谋学和帝王学等势利文化、权谋文化在当下中国的盛行，就能感受到权力及其谋略对当下中国的控制有多么深厚。道德意识的模糊和混乱，给集中化的政治权利提供了口实和机会，程序理性存在回归到僵化的官僚主义程式的极大可能性；政治权力太过强大，导致经济基础被政治上层建筑统治过深，导致权力经济压制知识经济和自由经济生长，使本文对程序化的科学管理、对程序协商分权的前景也不得不充满疑虑，如果乐观也是谨

慎的。

比如，或许是有感于以科学为道德的单薄无力，或许真正地想把宪法和法律程序真正地作为一个独立于实质理性的价值，2007年12月，胡锦涛提出了“三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但现实却表明这种一锅粥似的混乱表述，只会带来执政理念和执政行为上更大的混乱。最近的一个典型事例，就是“逯军事件”。据报道，2009年6月，他对记者说了一句颇能反映时代特征的话：“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引起巨大反响。《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相继予以批判；最高人民法院召集11位“知名法学家”论证“三个至上”“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法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结合、社会主义法律与中国共产党政策相融合的当代法政治学、法社会学形态”。主流媒体的批判旗帜鲜明，它们直接代表了当政者的态度。但以“三个至上”的统一来平息民情和舆情，在政治运作上是可以理解的，在逻辑上和现实生活中却是荒谬的——许多干部私下坦承：逯军说的是实话。“三个至上”的最终结果，是排在最前面的那个“至上”成为压倒一切的，唯一的“至上”，不可能统一。本文认为，“党的事业至上”这种存在多元标准的实质理性，如果不做严格的界定就只会被“党的”各级权力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作出有利于自身的多种解释、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解释，最终的结果，肯定也不是什么“党的事业至上”，而是“权力”至上；“逯军现象”，表达了当下中国的思维混乱导致了现实生活世界的真实乱相。

尽管问题不少，但中国式的程序化改革毕竟已经经历了三十年的发展，并业已迈进科学和民主的殿堂。虽然对科学和民主的理解与西方存在或小或大的差异，但正如《制度经济学》所言：“一个社会究竟赋予其制度什么样的内容只能由该社会的成员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来决定，它只能通过渐进的、演化性的试错过程来发现。中国以及亚洲的

其他国家现已置身于这样一种过程之中。”^[92]中国的程序理性，在常识理性和实用主义的传统文化影响下，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冲击和直接作用下，已经由一开始懵懵懂懂的试错性渐进探索，发展到中间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制度化 and 规范化的程序理性；由于 1990 年代的去意识形态化的程序理性有导致道德失范之虞，21 世纪的程序理性又试图把道德请回来。

把道德重新请回来，那就存在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一是道德和程序理性各自独立地二分，二是道德重新成为主导一切的正当性基础。为了保证程序的独立地位并接受中国社会需要道德理想的传统和现实，新程序主义旗手季卫东提出了程序与契约的循环论证说，即“契约的非契约论基础是程序，程序的非程序性基础是契约”^[93]，试图通过把道德理解为一种心理契约以与程序相对立地统一。这在逻辑上是可行的，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法治国，就是建立在这一程序理性的哲学基础上的。但且不论它在西方是否能够成为现实，考虑到东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政治基础的不同，就会对其中国前景产生更多的疑虑，以科学的名义复古到道德意识形态统治的第二种方向，目前看来似乎更占上风。

但上文已经反复论证，道统思维最终导致的是道德真空或道德虚化、道德泛化、道德模糊化。道德理想的混乱和虚妄，给了集中的政治权力将程序拉回到工具性僵化程式以机会。僵化的权力机制必然催生腐败这颗毒瘤，毒瘤越涨越大又使国人呼唤重建道德。这样，中国就会陷入权力与道德的恶性循环之中。如何破解呢？程序理性当然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困难和阻力相当巨大。如何克服？需要相当雄伟的理论魄力和相当高超的实践技巧，殊为不易。如何融贯中西地处理与道德和权力的关系，是中国未来程序化建设的关键，也是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为人类文明发展有可能做出贡献的地方，这也才是“中国模式”所应探讨的核心问题。处理得好，或许就是一种新的智慧、新的现代化模式、新

的更“科学”和更人性的程序理性。

- ¹ 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博士后、爱知大学大学院中国研究科博士生
- ² 邹东涛同萧功秦类似，很早就关注中国经济体制的“渐进式道路”并进行理论总结，如 1999 年的《文化冲突、文化整合与中国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 年第 6 期）等。最近的系统思考见之于《“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与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2006 年前后在洛杉矶“旅美中国社会科学教授协会第 11 届年会”、“中国经济学会年会”、“博鳌论坛”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政府转轨国际论坛”等会议上的讲演）和《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路线图与大智慧》（《江西社会科学》，2008.10）等。
- ³ 这里的变数，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甚至本文的发表和传播范围的大小都可能对程序理性在中国的未来进程产生或有或无、或零或大的影响。
- ⁴ 价值理性是韦伯在定义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时的发明。他在构造出 *wertrational* 这个词汇的同时，也指出价值理性始终是非理性的。施路赫特用形而上-伦理理性表达类似含义。
- ⁵ 事实上，冲决一切网罗的革命精神在中国永远都不会只是一个过渡。作为弥补和制衡程序理性局限性的一个对立面，革命激情永远是人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随着经验主义和理想主义（顾准、陈敏之、王元化语）的交相起伏而此起彼伏罢了，不能绝对地说孰有益孰无益、孰正当孰不正当。
- ⁶ 《管子·形势篇》。
- ⁷ 应该指出的是，不惟 1970 年代，中国数千年来来的政治哲学其实都是这种道德统治论，很少例外时期。
- ⁸ 《管子·形势篇》。
- ⁹ 现代程序来自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法则（*natural law*）。后者经过奥卡姆剃刀等掀起的唯名论革命之后，自然法则一分为二为实验科学中的科学规律和现代法律中的自然权利，（M.A.Gilleapie, *The Theological of Modernity, Critical Review, Vol.13, No.1-2*）下一步才有了科学程序与政法程序的分野。涂明君在《程序化的哲学阐释》中把它们归结统一为程序理性。
- ¹⁰ 《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把最后一句话“这话没有错”表述为“我没有放弃”。
- ¹¹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 <http://www.cnki.net>。下

同。

- ¹² 事实上,钱学森本人虽不是最高层领导,但是中共九大、十大主席团成员,十大中央候补委员,第四届人大主席团成员,是仅低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级干部。钱的这个政治地位在中国的影响力很大。
- ¹³ 图1表明,控制论研究大致上有三个高峰期,1964-1965年,1981-1982年,2003-2004年。第三个高峰期显然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有关,但具体读文章就会发现很多是回顾性的。
- ¹⁴ 金观涛和刘青峰阅读本文初稿后以电子邮件回答了作者的猜测,指出金峰确为金观涛和刘青峰,樊雷为樊洪业和雷祯孝。
- ¹⁵ 如作者根据本文初稿在2009年4月“首届全国中青年科学技术哲学论坛”(江苏·南京)作报告时,肖显静和吴国盛曾就此与笔者商榷。尊重这些不同的意见和批评的同时,笔者依然坚持自己正文中的观点,并且感谢这些质疑促使本人修改稿更清晰地表述自己的看法以供进一步讨论。
- ¹⁶ 随着1990年代后经济学、管理学热潮的兴起,西蒙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决策过程及其机制的管理行为研究——有限理性下的满意决策理论,在中国经济管理学界激起了长期而巨大的回响,对中国的管理实务产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本文作者认为,西蒙的影响其实还不仅于此,他所提出的程序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有着西蒙本人都没有完全意识到的重要性,值得深入研究。详见涂明君:《程序化的哲学阐释》。
- ¹⁷ 查阅《辞源》和《汉语大词典》,就会发现缓慢至多只是“渐”的引申义,逐渐发展、次序进行、从头开始才是“渐”的本意。
- ¹⁸ 事实上,1980年代初作为思想意识形态主导的“五讲四美”中,就包括“讲秩序”。但1980年代对秩序的理解,显然还很表浅,甚至仅仅停留在“排队论”的层面。当然,不能说今天中国人的秩序意识一定比1980年代强——就拿简单的排队来说也远远不如近邻日本的自觉化程度高,但对秩序的理解的确丰富了许多。
- ¹⁹ 在英语中,纲领化(programming)和程序化(proceduralization)是一个近义词。programming既可以翻译为纲领化,也可以翻译为程式化或者程序化。
- ²⁰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 <http://www.cnki.net>.检索范围为“学术总库”中的“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下同。
- ²¹ 检索时间为2009年8月31日,2008年数据

或恐不全。

参考文献:

- [1]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
- [2]林岗:《中国的经济改革道路:实质、意义和前景》,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1).
- [3](美)乔舒亚·库珀·雷默等:《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 [4]黄平、崔之元:《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5][89]俞可平、黄平、谢曙光、高健:《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 [6]吴江:《“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载《理论动态》,1977年7月第一期(创刊号).
- [7]张志明:《走出迷谷:1967-1979年中国政体变革的历程与思考》,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
- [8]戴煌:《胡耀邦与55万“右派”的改正》,杜导正、廖盖隆主编:《历史谜案揭秘》,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8.
- [9]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 [10]《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
- [1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
- [12]《中共中央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送来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总结的三个报告》,1970年3月15日.中发(1970)17号.载于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数据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
- [13]《陈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14][21]《陈云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 [15](美)R·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16](美)R·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17]涂明君：《革命中国兴起过程中的程式化与反程序》，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第五届国际研究生“当代中国”研讨班，2009。
- [18]《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19][20][24][25][36][40][53][8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2]（美）成中英：《文化、伦理与管理：中国现代化的哲学省思》，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 [23][2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6][56][75]涂明君：《程序化的哲学阐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8。
- [27]《邓小平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 [28]李惠国：《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上讨论的一些理论问题》，载《哲学研究》，1978年4月。
- [30][31]金峰、樊雷：《控制论与制度改革》，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0年第3期。
- [32][39]金观涛、华国凡：《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 [33]刘青峰：《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 [34][76]刘大椿：《科学活动论·互补方法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35]李君如：《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
- [36]《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7年10月25日。
- [37]《人民日报》编辑部：《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载《人民日报》1966年8月17日社论。
- [38]朱新明、李亦菲：《架设人与计算机的桥梁：西蒙的认知与管理心理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 [41]李泽厚：《世纪新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 [42]（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43][50]刘大椿：《科学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44]苏文：《山重水复应有路：前苏总国家转轨进程再评述》，载《东方》，1996年(1)。
- [45]《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12日。
- [46][57]（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 [47][58]（德）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48]金观涛：《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2008，未刊行。
- [49]涂明君、艾志强、刘柏志：《科学管理公正观及其对科学发展的启示》，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4)。
- [51]吴向红、刘大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研究状况综述》，载《教学与研究》，1992(2)。
- [52]刘大椿：《从中心到边缘：科学、哲学、人文之反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54][55]《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 [59][60]刘海年、李林：《依法治国与法律体系建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 [61][71]涂明君、李佩琼：《改革开放30年的程序化建设历程》，载《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8(6)。
- [62]（德）普塞：《哈柏玛斯》，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89。转引自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 [63]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
- [64][69]《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
- [65]涂明君、岳玲、戚璇：《科学管理源流考》，载《科学管理研究》，2008(2)。
- [66]涂明君、戚璇、岳玲：《科学管理的管理哲学思想》，载《科学管理研究》，2009(2)。
- [67][86][88]《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
- [68]《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科学发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
- [69]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北京：学习出版社，2009。
- [70]《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04-09-27。
- [72]《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2008。
- [73]《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

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74] Bridgman, P.W. *The Way Things A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77] 刘大椿：《从辩护到审度：马克思科学关于当代科学论》，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78] 张志明：《从民主新路到依法治国：为人民民主奋斗八十年的中国共产党》，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

[79] 闫健：《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80] 许纪霖、罗岗等：《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81] 孟建伟：《论科学的人文价值》，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1999。

[82] 刘大椿：《在真与善之间—科技时代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84]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5] 吴国盛：《科学与人文》，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4)。

[87]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90] 新华网北京12月25日电（记者孙承斌、李薇薇）：《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扎扎实实开创我国政法工作新局面》，《光明日报》，2007-12-26；中央电视台，12月25日《新闻联播》等。

[91] 《郑州经适房土地建别墅 记者采访被质问替谁说话》，<http://www.cnr.cn/>。

[92] (德)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93] 季卫东：《法律程序的形式性与实质性：以对程序理论的批判和批判理论的程序化为线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ol43(1), 2006年1月。

[94] (美)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译自英文1978年版。

[95]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